

程序正義六準則：胡適《澄衷日記》一則的法治意蘊解讀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

2000 年夏天，北京大學圖書館在館藏胡適遺留書籍和文件中發現了迄今為止胡適最早的日記，是他當年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的日記手寫本，始於 1906 年 2 月 13 日，終於當年 7 月 26 日。雖然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跨度，但因為時值胡適——那時他尚未滿十五歲——接受西式教育的最初時期，不僅是顯示上海早期教會學堂之外西式教育狀況的珍貴文獻，也是反映胡適思想形成過程所受影響的稀見史料。北大圖書館很快就編輯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將其以《澄衷中學日記》為題收入其中，影印出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在日記中，胡適記錄了他閱讀英國學者和政治家休·奧克雷·阿諾德-福斯特（Hugh Oakeley Arnold-Forster，簡寫 H. O. Arnold-Forster）的作品《國民讀本》（*The Citizen Reader*），其中列舉法律格言六條，多涉及普通法傳統的程序正義準則，胡適在日記裡將其翻譯為中文。本文在引言中對原作者的生平略作考訂，並糾正《胡適日記全集》臺灣遠流版編者曹伯言的若干訛誤，正文分別就這法律格言六條的含義加以界定，在此基礎上，或比較中西法律傳統之差異，或結合胡適生平事蹟「以身說法」，或聯繫當今司法制度揭示理念與制度變革之應有導向，力圖為胡適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也希望有助於樹立程序正義在當今中國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關鍵字

胡適、澄衷學堂日記、法律格言六條、程序正義

壹、緣起

在曹伯言先生編輯的《胡適日記全編》中，最早的日記是開始於 1910 年 1 月的《藏暉室日記》。應了那句「全集難全」的行話，幾乎與「全編」出版同時，北京大學圖書館即在本館所藏胡適遺留書籍文件中發現了更早的日記，是少年胡適當年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的日記手寫本，始於 1906 年 2 月 13 日，終於當年 7 月 26 日。雖然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跨度，也很少長篇大論，但因為是胡適——那時他尚未滿十五歲——接受西式教育的最初時期，不僅是顯示上海早期教會學堂之外西式教育情形的珍貴文獻，也是反映胡適思想形成過程所受影響的稀見史料。北大圖書館很快就編輯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將其以《澄衷中學日記》為題收入其中，影印出版。臺北聯經版的《胡適日記全集》該慶幸「吾生也晚」，可以把它收入其中，使得該版本不僅刪去了安徽版日記裡各種訛誤俯拾皆是的編輯者註釋和譯文，而且因為收入了余英時先生的長篇導言、《澄衷日記》、臺北胡適紀念館所藏未收日記以及「人名索引」，而具有了更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價值。

《澄衷日記》丙午年四月十五日（陽曆五月八日）：¹

余等近日所讀之《國民讀本》所論法律之公例六條，甚切當，譯之。²

1.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凡人對於法律皆平等）
2. Every man is held to be innocent until he is proved to be guilty.（凡人未為他人證其有罪之前皆當以無辜待之）
3. No one can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同一罪名不能經二次之裁判）³
4. All courts of justice are open to the public.（公堂皆洞開，恣人觀審）
5. No one is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凡人不能裁製關切己身訟事）

1 清華版頁 28-29；聯經版卷一，頁 26。

2 原文無標點，此句曹伯言斷句為「甚切，當譯之」。張立茂編注本《胡適澄衷學堂日記》（文匯出版社 2017 年版）亦如此斷句。胡適下文已經逐句譯出，無待「當譯之」。故斷為「甚切當，譯之」或更切當。

3 曹伯言錄為「裁製」，但據手跡判斷，應為「裁判」。

6.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the law in his own hand. (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

以上六條惟第三則

在此前的日記如 3 月 17 日和同月 21 日（均為陰曆）也提到了《國民讀本》這本書，作者是英國人休·奧克雷·阿諾德－福斯特（Hugh Oakeley Arnold-Forster，簡寫作 H. O. Arnold-Forster），⁴1855 年出生於印度旁遮普邦一個英國殖民官員之家，四歲時其父親去世，姑母收養了他，於是他的姓氏就變成了父親（Arnold）和姑父（Forster）姓氏的合體。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牛津大學，1879 年獲頒出庭律師（Barrister）資格。次年擔任其姑父即養父、愛爾蘭事務首席大臣福斯特（William E. Forster）的私人祕書。也許是受熱心推動初等教育改革的養父影響，他 1885 年進入知名出版機構 Cassell & Co.，主持了教育領域的系列叢書。後來進入政界和軍界，官至陸軍大臣，1909 年去世，得年 53 歲。

阿諾德－福斯特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 *The Citizen Reader*，作者養父的序言作於 1885 年，列為在英語世界頗受中小學歡迎的 Cassell's Modern School Series 叢書之一種，到十九世紀末就發行多達十幾版。⁵看起來在二十世紀初，這本書已經成為得歐風美雨之先的上海學校裏的參考讀物了。

胡適對該書評價很高，說：「其於國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闡無遺，其中哲言法語足為座右銘者不可勝數」。⁶

他引用並翻譯的這一節出自讀本的第八章第一部分，⁷題為「審判」（The Trial），本章第一節首列「法律格言」（Maxims）。⁸作者開宗明義地說：「現在

4 曹伯言辨識錯誤，把 Forster 誤為 Jorster 了，張立茂編注《胡適澄衷學堂日記》也犯一樣的錯誤，後者還特別標註譯名「喬世特」。另外，前述兩書和許多引用者都沒有注意胡適原文特別標出其姓氏本是兩個單詞的合體，中間有一短連線，而誤會為他姓 Jorster——不，是 Forster，名 Arnold，這個錯誤好比把諸葛亮誤為姓「諸」，名「葛亮」了。

5 除了本書外，作者的其他著作還有《日常生活中的法律》（*The Laws of Everyday Life*）、《英格蘭史》（*A History of England*）、《當今英國社會主義》（*English Socialism of To-Day*）等。

6 3 月 21 日的日記，清華版頁 17。

7 原著頁 74 起。

8 亦稱法律諺語，或簡稱法諺。因長期流傳，公認具有無待立法確認之法律效力。胡適譯為「公例」，或較「法律諺語」更貼切，雖然這個詞今天很少用了。

我要敘述一下在法院的法官面前進行的一次審判，但是首先你們要明白，在英格蘭法律得以實施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法院都必須遵循的幾項偉大規則」，作者先是列出四項，即胡適日記裡的前四項，接著又補充了後兩項（因為原書前文已經提到了那兩項）。此後，通過對一個虛擬的盜竊案件偵查和審判過程的敘述，包括案發後警察的調查與拘留、被告人接受治安法官詢問、大陪審團之審查、律師代理、法庭上審理陪審團的組成、控辯雙方對於證人的詢問尤其是詢問對方證人的程序、傳聞證據的排除、審判程序的公開等各個環節，展現了英國以及普通法國家的司法是如何嚴格地遵循這些程序規則的。

寫給中學生的讀本裡都加以列舉和論述，不妨將此六條視為英美法刑事訴訟中奉為圭臬的程序正義六大基本準則。下面我們分別對這六大公例以及胡適的翻譯做一點簡要的分析，並借題發揮，做一些延伸討論。

一、公例 1.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凡人對於法律皆平等）

這一條不僅是訴訟法上的一個規則，也是一項憲法規則，更是世界範圍內最流行的一句法律格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門楣上端也刻著這句話的更簡潔表達：Equal Justice under Law（法律之下的平等正義）。胡適的翻譯稍嫌繞口，不如後來的通常譯文明快暢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是許多國家憲法以及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對國人而言也屬於稀鬆平常的認識。不過，想像處在光緒三十二年的少年胡適，耳聞目睹那個時代中國衙門司法的狀況，這種法律之前人皆平等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兒時便熟讀舊小說，想必對其中一些涉及衙門審案的故事爛熟於心。⁹例如《水滸傳》第八回中的審判，林沖遭高俅陷害，被押解到開封府審理。私下裡「當案孔目」孫定與滕府尹的對話：

（孫定）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沖，只可周全他。」

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周全得他？」

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9 《澄衷學堂日記》四月初八日：「予幼嗜小說，惟家居未得新小說，惟看中國舊小說，故受害滋深。今日腦神經中種種劣根性皆此之由。」清華版，頁 25。

府尹道：「胡說！」

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

還有，《紅樓夢》第四回，那位門子發現賈雨村對「護官符」竟茫然無知，大為吃驚：

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

此外，各種謠諺、筆記、戲劇裡關於官衙司法的評價，充斥著腐敗、不公和不信任。日本學者編輯的一本關於中國古代諺語的書中有涉及訴訟的專門一節，八條諺語是：

1. 官斷不如鄉斷；2.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3. 十場訴訟九場和；4. 十場人命案九場奸；5. 氣死不告狀，餓死不當當；6.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7. 打死人，要抵命，哄死人，不抵命；8.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¹⁰

都足以表明，對於中國而言，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更廣泛的司法正義，真正是兩千年來最無從企及的一個夢想。

當然，即便是在今天，這種平等的實現也還有太多的障礙。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說到法律面前的平等，人們通常只是想到法律對待弱勢者與強勢者應當平等對待，很少人會意識到平等原則實際上涉及到在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上法律的平等適用，涉及到在一國之內如何讓不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對於法律解釋上遵循同樣的規則，也包括時間意義上，讓今天的法官與昨天的法官遵循同一準則。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司法決策中法律與政治、道德等考量的分離，需要司法官群體對法律知識與法律推理技術的共享，需要複雜的技術設計與程序安

10 田中清一郎：《中國的俗諺》，白水社 1979 年版，頁 177-179。引文省略了作者的翻譯和註釋。

排。普通法國家通過上訴和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決以及嚴格的遵循先例準則——當然也包括在情勢變異的情況下嚴格控制的推翻先例，從而提供了法律面前平等的堅實屏障。反觀中國，司法不獨立，司法管轄與行政區劃之間高度重合，司法在人事、財政等方面受控於同級黨政，高等級法院在統一法律解釋上的無所作為，法院在定罪量刑上受制於監察委、檢察院甚至公安局等上游權力，加上立法本身的粗陋，尤其是某些所謂「口袋罪」留下的恣意空間，所有這些，都導致了案件的判決失去了基本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

二、公例 2. Every man is held to be innocent until he is proved to be guilty. (凡人未為他人證其有罪之前皆當以無辜待之)

此即為聲名顯赫的「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原則。胡適譯文裡的「他人」稍有歧義，其實，這裡的證明責任是由指控犯罪的政府機構來承擔的，不如刪去「他人」，譯為：「凡人未為最終證明其有罪之前皆以無辜待之」，或更妥當。

「無罪推定」是近代西方法律的一項得到普遍接受的準則，是刑事司法中保障人權的基石之一。不過，美國學者亞伯拉罕在其經典著作《司法程序》一書中還是極力主張「無辜直到證明有罪」(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是一項盎格魯-撒克遜，即英國起源的準則，它深深植根於普通法的歷史與法律哲學之中，並在不同程度上，構成了為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堅守的自由與正義概念的根基。他特別列出與這一原則相對立的法國模式，是一種反向表達，即「有罪直至證明無辜(guilty until proved innocent)」(Abraham, 1993)。這當然是有爭議的觀點，因為更多的人相信大革命時代法國的《人權宣言》已經明確地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法國重量級比較法學家達維就明確地說：「那種『認為在法國，一個被拘捕者在證明為清白無辜之前被推定為罪犯』的看法就是一種偏見」。¹¹但是，亞伯拉罕認為法國的法官乃是政府機器的一個環節，在一種「糾問主義程序」(inquisitorial procedure)中，法官必須積極地去分辨誰是真正的罪犯。在預審程序中，法官與檢察官以及警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11 參看達維(R. David):《英國法和法國法：一種實質性的比較》，潘華仿、高鴻鈞、賀衛方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79-85，對於法國的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了客觀的利弊分析。

可以主動調查證據，英美國家為確保法官中立以及被告人受到如無辜者般對待而設置的多種程序並不存在，因此「無罪推定」終難確立。

具體言之，「無罪推定」需要在程序以及操作層面上的一些規範。舉起犖犖大端，法官的中立和消極，證明犯罪的全部責任都由檢察官承擔，不得要求被告自證清白，最大限度地減少審前羈押（例如英美國家廣泛實施的「人身保護令」），辯護人有權蒐集包括向政府機構強制調取對己方有利證據，控方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必須排除，對犯罪證明須達到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即依據常識常理絕無疑問），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充分的質證與辯護權等等。制度設計的核心價值乃是對政府權力的嚴格限制以及確保無辜者不受追究。

寫到這裡，不禁想起了胡適在研究（用他的話說叫「審理」）《水經注》疑案即戴震是否剽竊全祖望、趙一清成果這一「案件」時發出的一个感嘆，其中包括對傳統中國證據法的反思，我在另一篇關於胡適與證據法的文章¹²裡曾引用過，不避重複，這裡再複述一下：

我因研究《水經注》大疑案，始悟中國向來的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於被告的。我作英文 Note（《全祖望、趙一清和戴震校注〈水經注〉之研究》）述此案重審的結果，我只須說：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hat Tai Chen had seen or utilized the works of Chao & Chuan¹³就夠了。但我寫中文報告時，才感覺這種說法不夠，——在中國人的心裡，「空穴來風，必有所自」，故報告必須提出有力的反證，單駁斥原告所提證據是不夠的。

我因此改寫我的《水經注》案全文，一面駁斥百年來提出的證據，一面提出戴未見全、趙書的十證。

我因此又想到中國法庭的「證據法」的問題與人權保障有關切，若證據法不明，法律的實施將不夠保障人民的名譽與生命財產。「罪疑惟輕」等於說「證據不夠，只宜從寬發落」。這個從寬發落的人終身不

12 賀衛方。2022。〈胡適的證據法思考〉。《月旦民商法雜誌》76：40-51。

13 引者譯：絕無證據顯示戴震曾目見或利用過趙和全之著作。

能洗刷他的冤枉，不能恢復他的名譽。¹⁴

胡適關於「中國向來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於被告的」這一看法表明，中國衙門司法程序也是一種「有罪直至證明無辜」的模式吧。

三、公例 3. No one can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 (同一罪名不能經二次之裁判)

讀者應該注意到了，在文章開始引用的胡適這則日記的末尾，有一句寫了半截的話：「以上六條惟第三則」，或許正巧因事而停筆，後來也沒有續寫。這戛然而止的話讓我想像，胡適未完成的話是什麼？該是「惟第三則頗難解」嗎？的確，從字面上看，六條之中，其他五條都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同一罪名不能經二次之裁判」，含義的確有幾分不合常理。¹⁵《國民讀本》第八章在講述那個虛擬的盜竊案審判的末尾，說經過證人作證、檢察官和律師質證和辯論、法官對陪審團作出必要的案件梳理和指導等程序，最後是陪審團宣佈裁定。如果裁定是無異議判其「無罪」(not guilty)——

被告人即可走出法庭成為自由人，無論今後發生什麼情況，他將永遠不會因這起盜竊案而陷入再次被控告的危險之中，因為「任何人都不可因同一起犯罪而遭受兩次審判」(Arnold-Forster, H. O & Forster, W. E, 2023: 86)。

接著作者又強調說，法庭程序「自始至終都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即揭示真相，揭示全部真相，惟有真相而無他事；讓無辜者得自由，讓有罪者受懲罰。」

但是，也許胡適會心生疑慮：假如這次宣判之後，檢察官又發現了足以證明那位已被無罪開釋的被告人就是真正實施了盜竊的人，上次只是沒有發現這個強有力的證據，讓他得以逃脫，難道就任由這個犯罪者逍遙法外麼？坦率地說，不只是一個半世紀之前的胡適，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能夠理解和接受這樣的規則，又有多少人呢？

14 胡適日記 1944 年 10 月 7 日。

15 拉丁文有法諺謂 *nemo bis punitur pro eodem delicto*，不過拉丁法諺強調的是「不能經二次之懲罰」，英文作 *No man is punish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79.

在英語中，因同一項犯罪指控而遭兩次審判的情形被稱為「double jeopardy」，譯言「雙重危境」¹⁶，也有譯為「一罪二審」的。將這項規則上升到憲法權利層面的是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1791年批准），其中明確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在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雙重危境」規則可以規範聯邦與州之間的司法管轄權，以免雙重追訴。同時在同一管轄範圍內，也要確保被宣佈無罪者不可受到因同一項犯罪的再次指控。當然，某種限制仍然存在，例如審理（trial）尚未開始或陪審團因無法達成一致而須另行組成陪審團的案件，或者上訴法院將對案件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者，則不受「雙重危境」之限制。

現代英美法律文獻裡，對於這項權利的正當性沒有多少論證，也沒有很多相關案例受到關注，多半是由於此屬於在更早的時代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的事項。但是，在當今中國，刑事訴訟法中對此卻沒有規定，共識更是無從談起。刑訴法專家王敏遠教授在2007年曾發表文章，呼籲禁止雙重危境原則亟待引入中國刑事訴訟法，以期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王敏遠，2007）。據我的這位老友見告，呼籲無效，沒人理睬。所以，至今仍很有必要對其制度原理做更深入的討論，以求立法的改進。當然，這裡只是略作申說而已。

被告人權利的保障當然是最基本的考量。對刑事司法實際不大瞭解的人，往往一想到法庭上的犯罪嫌疑人，總有一種先天的偏見：無緣無故怎麼可能被警察抓到並通過檢察官審查而起訴到這裡呢？可是，現實中的確有很多的無辜者遭到這樣的危難。有些是證據方面的錯誤，尤其是刑訊逼供所獲取的口供。在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發現的聶樹斌、呼格吉勒圖、趙作海、佘祥林等的殺人犯罪，前兩人都判處死刑並執行了，後來真兇落網或「死者」復活，人們才知道他們本是無辜而屈打成招的。另一種類型的錯誤也許更廣泛，諸如被歸為尋釁滋事類的許多行為，罪與非罪之間界限模糊，本不該追究的行為也遭到追究。即便在法治基礎很穩固的國家裡，法庭上被告人實際無罪者也佔有相當的比例。

16 參看倫斯特洛姆：《美國法律辭典》，賀衛方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160-161。

反過來說，在法庭上幸運地獲得無罪宣告的那些人，也未必真是無辜的，有的不過是檢方沒有找到最確鑿的證據，難以完成「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鏈條而已。法庭無法確定他們有罪，也只能跟那些確實無辜者一樣宣告無罪，當庭釋放。立法確定政府永遠放棄對於其指控犯罪再追究的可能，其實也是一種價值的權衡。如果政府總是可能再追訴，過了幾年發現某個證據，就再逮捕，再起訴，但也許再落空。如此無休無止，如果針對的是無辜者，豈不讓人永無寧日？古法諺有曰：「民之安寧乃最高之法律」（*Salus populi est suprema lex*），不獨民不安寧，官也折騰不已。讓個別實際犯罪者不再被追究，得到的是更廣泛的安寧良好的生活秩序，正是價值權衡中的合理選擇。

第二個考量是，「雙重危境」規則可以激勵檢察官對於犯罪指控進行最周密和努力的調查和取證，因為任何引起常理質疑的不實證據足以導致檢察官以及警察們前功盡棄。同時也鼓勵他們對於難以得到陪審團和法官採納的證據加以排除，甚至對沒有把握的案件選擇放棄，這也有助於人權的保障和減少司法訟累。

最後，涉及到的是司法尊嚴的問題。從英美法的傳統說，在法院審判過程裡，在充分聽取和審查各種證言與其他證據的基礎上，作為社區代表的陪審團所作出的無罪判決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如果檢察官還可以對代表著鄰里良知的陪審團的判斷加以質疑，這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接受的。不是因為權力的高下，而是從事實判斷的角度看，沒有任何人比宣誓公正無私作出裁決的被告人社區代表群體更適合判斷事實問題了。所以，那種容許不斷地推翻在正當程序環境下的無罪判決的做法，實際上也把司法尊嚴置於危境之中了。

四、公例 4. All courts of justice are open to the public. （公堂皆洞開，恣人觀審）

胡適這一條的譯文頗有些修辭學的特色，今天的翻譯要平實得多：「所有法院均向公眾開放」。在經歷豐富的一生中，胡適很少有親自參與訴訟或到法庭旁聽的經歷，我所知道的，僅有兩起出席法庭的記載，一是北大法語教授梁宗岱的離婚訴訟，另一起是他作為北大校長旁聽美國軍人皮爾遜強姦沈崇案的審理。在梁宗岱婚姻糾紛案中，胡適作為證人親自出庭作證。留學法國的詩人

和文學家梁宗岱曾在巴黎接待過來訪的胡適，留法歸來，也是應作為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之邀，擔任北大法語系教授並出任系主任。但未曾想，梁氏不久就鬧出了婚姻糾紛，胡適從中斡旋未果，最終梁氏原配夫人何瑞瓊將案子起訴到了法院。胡適頗不滿於梁氏的不通情理，為何瑞瓊聘請了名重一時的大牌律師林行規代理此案，不僅如此，1933年11月25日北平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時，胡適還攜夫人江冬秀及陳受頤教授親自充任原告方證人。有趣的是，畢業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並獲林肯律師會館出庭律師頭銜的林行規律師，當時也兼任北大法律系教授。梁宗岱方面呢，請的律師也是大牌——留學日本、著述宏富的民法學家戴修瓚，又是北大法律系的名教授。我們可以想見，一起普通婚姻案，被告人、雙方代理人以及證人均為北大名教授，那次審理是何等地轟動士林與市民，媒體記者親自觀審報導，各高校學生紛紛湧到法院旁聽。

據報紙報導，這一天真是公堂洞開，恣人觀審，法庭特別將審判安排在有兩層旁聽席的大審判庭進行。何瑞瓊的悲傷告白，梁宗岱的激昂陳詞，雙方律師的你來我往，都令觀眾興奮不已。終於輪到胡適作證了，所有人都豎起耳朵，想把他的每一句話都聽個仔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胡適卻是湊近了法官席，彷彿耳語一般跟法官敘說，旁聽者竟一句也聽不到。原來胡適見在場這麼多學生，心中很顧忌教授的隱私暴露在大堂之中，遂盡力保持士人體面。案件以梁宗岱敗訴告終，婚姻解除，但梁氏須給付何瑞瓊撫養費一千六百元，另付今後生活費五千二百元。胡適日記裡感嘆：梁宗岱不僅要付出比此前調解時所要求付出者更高之金錢，而且「名譽大受損失。小人之不忍，自累如此。」¹⁷不久之後，北大決定不再繼續與梁宗岱的聘約。

說完胡適的出庭軼事，讓我們回歸司法公開的含義問題。一般認為，司法公開就是庭審時容許人們自由旁聽，一些受到公眾關注的案件，媒體可以自由地報導，以滿足那些關注者的知情需求。當然，有些例外，例如案件涉及國家機密，或者涉及個人隱私，還有以未成年人為審判對象的，會採取不公開審理，除此之外，所有案件都應向公眾開放。如果某些案件要求旁聽者太多，法

17 胡適日記 1934年4月18日。梁宗岱案判決書全文，載《法律評論》第十一卷（1934年）第十二期。

院應最大限度地滿足這樣的要求；若空間實在不夠，則採取某種隨機選擇的方式確定可以旁聽者，不可進行人為的篩選。中國法院的審判，尤其是某些涉及高官或因特定原因而變得具有程度不同之敏感性案件的審理，往往由法院選擇特定人員旁聽，貌似公開，實則仍是秘密審判。而且，這種違反公開審判原則的做法在當下甚至有漸趨擴大的勢頭，這是特別令人憂慮的。由於個人研究興趣的緣故，每逢出國訪問，我都力爭到所在國的法院旁聽審判，無論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英國皇家上訴法院，還是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都無需查看證件即可進入旁聽。與其他國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十多年前某次我到北京海淀區法院旁聽，卻必須通過內部人士引領，而且還要將身份證暫時扣押於門衛處，方可進入，真是戒備森嚴，極盡防範之能事。

其實，即便開放旁聽，也只是司法公開的初步要求。其他重要的準則還包括：

1. 司法所適用的法律規則本身是公開發布的，而且必須最大限度地做到清晰而明確，而非《呂氏春秋》所謂「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所欲勝固勝，所欲罪固罪」。
2. 司法決策主體的確定。在法庭上坐堂問案的法官，應當是案件真正的審理者和判決者。假如庭上法官要受制於某種不在法庭上的人員或機構——典型例證即所謂主管院長、審判委員會甚至法院之外的政法委員會——的意志，勢必在實質上構成司法主體的模糊不清，使得司法決策的責任歸屬變得混亂，同時也嚴重削弱了法官的權力、權威和尊嚴，讓庭審過程變成了一場傀儡戲。
3. 證人出庭接受對質以及對證據的採信作出嚴謹的論證至關重要，這是訴訟過程中直接原則和言辭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每當念及時下中國刑事訴訟中不足百分之五的證人出庭率，都不禁感嘆：如此審判何談公開透明！
4. 司法判決書應當理性而細緻地回應雙方所呈示的證據，並且將案件證據與法律條文之間的邏輯關聯作出合理的論證。這會將法院所確認的案件事實與法官的法律推理過程以書面的方式固定下來，從而增進司

法判決所確立規則的確定性和透明度，當然也有助於公眾對司法權的監督。

5. 藉助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建立完備的司法判決數據庫，收錄全國法院所有的判決書全文（涉及國家機密或個人隱私之處可以作局部處理），從而讓司法權的運行完全處在陽光之下，讓司法腐敗以及權力的任何恣意運行都無所遁形，同時也會給對司法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案例資源。

五、公例 5. No one is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 （凡人不能裁製關切己身訟事）

「無人可為關乎自身利益案件之法官」，這可謂法律正當程序的首要準則，其拉丁文表達是 *nemo debet esse iudex in propria causa*。這項準則源於一種自然正義之要求，即裁判者必須在糾紛的處理中具有中立的地位。雖然表述來自西方，但在各種文明中還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例如傳統中國農村中，諸兄弟分家析產，要由娘舅作為主持人，正是出於主持者中立性的考量。現代訴訟法中，普遍規定了法官迴避制度，也是這一準則的體現。

法官迴避制度固然是對法官行使權力過程的一種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對法官加以保護的設計。試想，讓法官裁判與自己利益有關的案件，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傳統京劇《鉤包勉》、《赤桑鎮》裡的故事，包勉是包拯的親侄，又是對自己恩重如山的兄嫂的獨生子，但鐵面無私的包拯還是痛下狠手，讓包勉死於鋤刀之下，這情與法之間的張力固然讓戲劇的觀眾如醉如癡，但從司法制度的設置來說，把法官置於這種情感與倫理困境之中卻是極其反人性和不人道的，是正義所難以承受的代價。法官固然必須公正，但也需要仁慈，需要親情，迴避制度可以讓法官最大限度地擺脫這樣的兩難折磨。

其實，這個問題在包拯或者明清時代的中國也許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因為兩個因素限制的這種法與情之間衝突的發生概率，一是長期施行的任官迴避，即官員通常不在本省擔任官職的制度，另一個在州縣層面上只有一個官員執掌裁判權力的衙門體制，雖然吏員階層對於具體決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與帝制時代比較，今天我們建立了與行政、立法分離的法院和檢察院系

統，而越是基層法院，法官以及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生於當地的比例越高。一個縣城中千絲萬縷的複雜人際關係加上法官數量眾多，還有前面論及的司法權行使主體含糊不清的因素，經常讓迴避制度變得徒有虛名。

除了在個案審理中的法官迴避外，在現代司法制度的設置理念中，這一準則也需要在更宏觀層面上加以體現。法院如何在人事與財政體制方面不受政府平行的其他權力或地方權力的控制，具有超越的地位，也是極其重要的。其中，中國法院自掌司法行政權的做法就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例如按常規做法，法院辦公及其他設施的建設或採購，都是由法院自身作為合同甲方來實施的。一旦發生糾紛，則必然出現另一方當事人告狀無門或者由法院審理自己案件的後果。¹⁸

不僅如此，各級法院的管轄範圍與同級黨政完全重合，而且法院在人事財政等均受制於同級黨政的體制安排更是嚴重損害了司法權的中立性，這是治理體制的一個嚴重卻很少受到關注的極大缺陷。在足球比賽中，兩個不同地方的球隊的賽事，中國足協尚且必須指定第三地的裁判執法，但來自不同地方的訴訟當事人，管轄法院則不是被告人所在地法院，便是原告人所在地法院，而法院又在人財物方面仰賴地方權力，又怎能指望法院保持中立？尤其是當案件涉及到不同地方的利益之爭，法院只能迎合當地政府的意志，別無其他選擇的可能。這種體制對於司法權威與公正的傷害可以說是多麼嚴重都不誇大。

2004 年，有消息傳來，民政部計劃對於全國行政區劃作出改變，省級行政區劃由三十四個擴展為五十個。¹⁹ 這個改革給我一種很大的興奮，認為可以在行政區劃改革的基礎上，設置在高級法院層面上與行政區劃向交錯設置的司法區劃，即在行政區劃改變的前提下，將原來與省級行政區劃完全重合的司法區劃作出重新劃分，每一個高級法院管轄的範圍均涵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省級

18 賀衛方，〈當法院成為債務人〉，《南方週末》2003 年 12 月 18 日。

19 2004 年 1 月，時任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戴均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針對行政區劃問題談的一些個人想法。當時的報導稱：「分省、縮省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問題」。戴均良認為，省的規模過大，既不利於管理，對國家長治久安也沒有好處。從中國國土面積和人口考慮，中國設五十個左右省級政區比較合理。

行政區劃，如此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之間的分離。²⁰ 可惜，這次行政區劃改革最終無疾而終。

到了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內容，有不少值得關注甚至令人欣慶的舉措。尤其是有關司法改革，除了此前有的那種偏向於倡導性的話語——例如：「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之外，此文件中有了更實質和具體的措施：

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這是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涉及司法體制的一次最具深層意義的制度改革。地方司法財政人事統一由省級層面管理，這當然有助於司法權擺脫區縣和市級權力的控制，與此同時，「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也許提示人們可以設計在高級法院層面上與行政區劃交錯存在、互不重合的司法區劃。我當時的設想是，在保持現有省級行政區劃不變的前提下，減少高級法院的數量，基本的思路仍然是每一個高級法院——以及同一級別的檢察院——管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省級行政區劃範圍，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分離。我甚至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方案，那就是在全國設置十二所高級法院，管轄除港澳之外的所有省級區域。²¹

然而，近十年之後，包括縣市兩級司法機關人財物由省級統管在內，所有這些構思都沒有任何進展，中共中央的決議也不過是一紙空文。也難怪，在持續多年不斷地強調所有領域都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的大環境下，謀求樹立專業化的司法權威肯定是徒勞的。

20 賀衛方。2004。〈司法歸司法，行政歸行政：從「五十省」行政區劃傳聞看司法獨立之條件〉。《中國法律人》2：14-15。賀衛方。2005。〈借行政區劃改革之東風設置司法區劃〉。《東方早報》2005/9/10。

21 詳見：賀衛方。2014。〈司法區劃的構思〉。《中國法律評論》創刊號。

六、公例 6.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the law in his own hand. (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

好了，現在讓我們轉向這最後一條，這也是胡適譯文中比較容易引起歧義的一條。這條公例按現在通常的譯法，直譯應該是「任何人都無權將法律操於自己手中」。不過，中文意義究竟如何，還是有待界定。這句諺語，按《布萊克法律辭典》提供的拉丁文是 *nemo jus sibi decere-potest*，所附英文釋義有兩層意思：1、任何人都不得為自己而宣佈法律；2、無人有权將法律操於己手。實際上，這句法諺是指除了一些輕微案件以及某種特殊情形如正當防衛之外，政府對於刑事犯罪的追溯與懲罰具有壟斷的權力，不允許所謂「私力救濟」，即自我執法，私力復仇。

歷史地看，人類面對殺人、傷害、盜竊等通常列為「自然犯罪」行為的回應，早期社會都是依據「叢林法則」，通過受害人方面自身的力量去實施報復或其他形式的處罰的。即便是君主或政府立法，如古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也明確容許在特定情況下的受害人可以實施同態報復。不過，由於這類自力救濟在規模上經常是不可控的，個案的糾紛經常演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而且人們逐漸意識到某些行為不僅導致對特定當事人利益的傷害，而且也構成了對於公共秩序的破壞，政府權力便逐漸進入到一些嚴重刑事犯罪的懲罰之中，減少了私力救濟的空間。

在復仇問題上，中國傳統語境中頗有某些特殊考量值得注意。著名學者瞿同祖——跟胡適頗有一些交往的一位法學家和歷史學家——曾對中國歷史上親屬的復仇義務及其限制做了詳細的考察。²² 其中一個最為糾結的事項是對父母盡孝的義務與國法秩序之間的緊張。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²³

當然，對於這種復仇，很早就有加以限制的努力，瞿同祖先生說：

22 參看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一章第四節「親屬復仇」。瞿與胡適交往的記錄，見胡適日記1950年3月29日、4月10日、1956年8月1日。

23 《禮記·檀弓》。

《周禮》對於復仇的事作了種種規定。報仇有法定的手續，也有專管報仇事務的官吏，只要在事先到朝士處登記仇人的姓名，將仇人殺死便可無罪。又有調人之官，專司避仇和解的事，並且規定復仇只以一次為限，不得反覆尋仇。

一方面極力倡導親屬復仇，連同孔孟所主張的「同居相隱」、「竊負而逃」等交互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必須維護國法權威與社會秩序，其間的種種難以兩全的困境，對後世的司法實踐帶來了深刻影響，並引出意見領袖們的各種爭論。姑且舉一個瞿同祖先生沒有論及的案例。

在唐朝，武則天治下，發生過一起真實的復仇案件。御史大夫趙師韞外出公幹，被殺於一座驛站中，驚動朝野。殺人者名徐元慶，殺人後主動投案自首，稱趙師韞任縣尉時，將其父徐爽治了死罪，他是報殺父之仇的。消息傳開，輿論似乎對這孝子報仇的舉動給予很大的同情，朝中官員也大多讚賞徐元慶，認為報殺父之仇乃合乎聖人之教的行為。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若放縱此類殺人犯罪，則執法之士必人人自危，天下將不得安寧。一時間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雪上加霜的是，號稱「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議》對於這種復仇行為居然沒有提供如何處罰的規定，法無明文加劇了案件處理的困難。武則天斟酌再三，念其孝心，準備免除元慶死罪。正當此時，那位「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陳子昂呈上了一份振聾發聵的《復仇議狀》。

真不愧為不世出之大儒和詩人，首先把案件所面臨的倫理與法律的衝突展現出來：

夫枕幹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接著主要就是論證赦免徐元慶之死罪可能的危害，最重要的是，它帶來的後果是超越了這一起案件本身的：「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故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最可注意的

是，陳子昂還講了一個獨特的道理，即若赦免死罪，反而讓徐元慶德名有虧；只有一死，才能使其仁節圓滿。

陳子昂的結論可謂兩全其美——判處死刑，同時又「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即對徐元慶追加表彰，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讓天下直道而行。他甚至要求把這樣的處理方法樹立為一個永久的先例，以便後世遵行。

但是，這種既砍頭，又嘉獎，雙腳踏兩船的論證確實傳遞了矛盾的信息。無怪乎過了七十年後，另外一位大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不依不饒地對陳子昂的核心觀點提出直率的質疑。

柳宗元的立論，關鍵之處即在於誅殺與表旌不得並行。「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認為這種混亂比較導致民無所措手足，如此先例，還要「編之於令，永為國典」，真是咄咄怪事。

然後，他論證說，假如當年趙師韞及其他刑官制造冤屈，殺害無辜，那麼被害人之子復仇的行為就是守禮行義之壯舉，官府感謝還來不及，誅殺又何其荒謬？反之，如果趙師韞本是依法判決，徐爽犯罪當死，那麼殺死徐爽的是法律，而不是作出裁判的官員。對這種正當判決，復仇者所要殺害的不只是官員，而且包括國家的法律。將此種復仇者判處死刑，才是正義之舉，怎麼可以對他表彰？

柳宗元的結論回到了《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引用了《春秋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也就是說，凡是司法者依照公正的法律判決死刑者，則不得再復仇；如果有對此仍要復仇，便成為天下之公敵。恐懼「親親相讎，其亂誰救」，則是完全不必要的擔心。

不久，與柳宗元差不多同時代的韓愈也參與到論爭之中，讓這個艱難的話題變得更加複雜。相關記載很多，這裡就不再贅述了。總之，為尊長復仇導致的兩難處境恰好跟儒家倡導「君為臣綱」，但同時又為「湯武革命」張目一樣，乃是深植於中國傳統思想內部無從完美平衡的悖論訴求的一種典型樣式，也體現了儒家經典的理想倡導與帝王朝廷的現實需求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日本漢學家和作家幸田露伴說中國傳統文學裡復仇故事要少得多，《水滸傳》裡那麼多殺人，只有武松算是復仇。不僅數量有差異，而且像日本那樣把復仇視為神聖，渲染得那麼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的，中國很少，西方也不多。²⁴但是，瞿同祖列舉的很多事例表明，中國歷代史書記載的復仇事例以及相關爭議也是層出不窮的，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與日本相比，中國很少有為主君報仇的例子，這也是其來有自。自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諸侯國已經廢除，天下只有君主，沒有主君；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君主只能通過任命「流官」實現對各個郡縣的治理，結果常如蘇轍所謂：「貪刻之吏，習已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²⁵這樣的感嘆其實揭示了皇帝萬機獨攬而又政令難行之下的一種獨特現象——或許可以稱之為「蘇轍效應」，那就是，當皇帝有所索取或對權利或自由進行剝奪，則下達過程呈現的是不斷增多和加劇的趨勢；但假如是皇帝對百姓給予某種福利或優惠，那麼就變成了一種層層剋扣，愈來愈少的過程。這就必然導致臣民對皇權的日漸痛苦的感受，皇恩浩蕩懸高空，苛政如虎難逃脫。

當然，即便在日本這樣封建制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之際的國家，尚且有某種將天皇與將軍的恩情加以對比的說法，依照幕末一位支持幕府的義士的觀點，主君之恩近而大，而君主之恩遠且小，因而忠誠於主君便是更為基本的義務。²⁶日本天皇世祚遐久，萬世一系，尚有如此對比，中國不斷地經歷改朝換代，對君主的忠誠更是處在逐漸減損、反覆挫折之中。不僅四十七義士式的復仇屬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類，而且君主也難以喚起臣民發自內心的效忠和以死相殉的強烈情感。

24 參看：幸田露伴。2008。〈日本的文學與復仇譚〉。陳德文譯。見氏著《書齋閒話》286-292。中華書局。

25 參看：錢鍾書。1979。《管錐編》1008-1009。中華書局。

26 參看：丸山真男。2021。路平譯。《忠誠與反叛》15。上海文藝出版社。當然，在論及四十七義士事件時，荻生徂徠、太宰春台等徂徠派的儒學家們，又需要面臨武士對於將軍與大名兩者忠誠義務孰先孰後的矛盾，他們明確地斥責復仇武士，認為他們屬於擾亂幕府法律的暴徒。從事實角度看，赤穗藩主乃是因為在殿中拔刀傷人而被命切腹，並非吉良上野介所殺。對象錯誤的復仇完成之後，義士們向幕府投案，聽從發落，這種沒有立即切腹自殺的選擇，也被徂徠認定屬於貪生怕死，不合武士精神。結果，接受了徂徠的建議，幕府判決所有參與復仇的武士均切腹自殺。參看：北島正元。2019。米彥軍譯。《江戶時代》92-93。新星出版社。

寫了這麼多，是想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完全禁止「將法律操於己手」或私力救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甚至一些支撐私力救濟的理念也蘊含著某種不同權力——包括社會力量——之間相互制衡的張力。當然這已經超越了一般程序法學的範圍，成為憲法學和政治學的課題了，姑且留待學界進一步的研究。

貳、結語

個人閱讀所及，留學美國之後，胡適一生中似乎沒有再提到阿諾德·福斯特的《國民讀本》，那個層次的讀物已經屬於「小時候的營生」了。不過，他對於法治、憲政、人權保護等問題的關注卻是一以貫之、持續終身的。即便是在司法制度與訴訟制度這樣專門領域中，他也有對國民黨當局打壓司法獨立的公開抨擊，有對法律職業者尤其是執掌司法大權者恪守職業準則的奔走吶喊，有對以軍事法院侵奪普通法院管轄權的嚴詞指責，甚至有更具體的對中國法理學應向證據法轉向的熱切期盼，雖非主業，但某些時候也會殫精竭慮，毅然發聲，表現出大智慧與大勇氣。²⁷ 仔細觀察他後來的言行，少年時代在日記裡摘引並翻譯的英美司法程序正義六大準則，至少其中的精神還是構成了他關於合理制度想像的某種底色。

比這些針對具體事項的主張更重要的，胡適留學歸來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對司法制度與程序正義的巨大影響：立法語言更具有描述性，可以對特定行為及其法律後果作出嚴謹清晰的規定，減少了受害人尋法無門自力救濟以及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法庭中當事人的陳述、律師檢察官的辯論和法官的判決書均使用白話文，讓司法程序更加透明，公眾對司法權的監督有了更確定的憑據。還有，由於立法與司法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更易於溝通，現代立法又涵蓋了更廣泛的生活領域，某種全民性的權利與法治話語得以產生和流行，從而構成了法治社會得以奠定的文化基礎。彷彿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情景：「法律語言很

27 略舉幾例，以證其餘。1932年發文駁斥那種認為中國不適合推行憲政的論調。〈憲政問題〉，《獨立評論》第一號（當年5月）；1933年撰文指出中國歷史上沒有法律辯護士這樣的保障民權的職業階層，並呼籲一種足以保障民權的公正司法體制與律師階級的出現，還呼籲以正當的法律程序審理所謂「政治犯」。〈民權的保障〉，《獨立評論》第三十八號（1933年2月）；兩年後他又嚴厲批評警察肆意抓人，公民無法將人身自由之保障訴諸司法審查。〈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一四三號（1935年3月）；還有，晚年因《自由中國》及雷震案與言論自由權所作吶喊更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了。

容易就得到接受成為普通語言。法律的精神本來產生於法律學院和法院之中，卻點滴滲透到了學院與法院之外，進入社會從上到下的各個階層，終究使全體人民都感染上了司法官的習性和品位」(Tocqueville, 1966: 270)。

參考文獻

- 王敏遠。2007。〈人權公約與刑事訴訟法原則的修改〉。《法學研究》2007，4。
- 丸山真男。2021。《忠誠與反叛》，路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
- 北島正元。2019。《江口時代》，米彥軍譯。北京：新星出版社。
- 胡適。2001。《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八卷本。
- 胡適。2003。《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胡適。2004。《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十卷本。
- 賀衛方。2014。《司法區劃的構思》。北京：《中國法律評論》創刊號。
- 賀衛方。2022。《胡適的證據法思考》。台北：《月旦民商法雜誌》第76期。
- 達維(R. David)。2002。《英國法和法國法：一種實質性的比較》。潘華仿、高鴻鈞、賀衛方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瞿同祖。1981。《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
- 錢鍾書。1979。《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
- Abraham, Henry J. 1993. *The Judicial Process* 6th ed. 95-1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rnold-Forster, H. O. (Hugh Oakeley) & Forster, W. E. (William Edward). 1885. *The Citizen Reader: For the Use of Schools*. London: Cassell.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6.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George Lawrenc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Six Principle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an Entry in Hu Shih's "*Cheng Chung School Diary*"

Wei-fang He

Professor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2000,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discovered Hu Shih's earliest diary among the books and documents left by him in its collection. It was a handwritten diary from when he was studying at Cheng Chung School in Shanghai, starting on February 13, 1906 and ending on July 26 of the same year. Although the time span was just over five months, this period was significant as it marked the initial phase when Hu Shih — who was not yet 15 years old at the time — received a Western education. This diary is not only a precious document reflecting the status of Western education outside the early church school in Shanghai, 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 illustrating the influence on Hu Shih's ideological formation process.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soon edited *Hu Shih's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Diaries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included it under the title "*Cheng Chung Middle School Diary*," and published it in a photocop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 his diary, Hu Shih recorded his reading of *The Citizen Reader*, a work by British scholar and politician Hugh Oakeley Arnold-Forster (H. O. Arnold-Forster), which lists six legal maxims, most of which involv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Hu Shih translated them into Chinese in his diary. In the introduction, this article briefly examines the life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corrects some errors made by Cao Boyan, the editor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u Shih's Diary* (Linking Books, Taipei 2004) from Yuan-

Liou Publishing Taiwan. The main text defines the meanings of the six legal maxims. On this basis, it eith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traditions, incorporates Hu Shih's life story to illustrate the narrative through his own experiences, or links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to reveal the proper orient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ies of Hu Shih and also hopes to help establish the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today's China.

Keywords

Hu Shih, *Cheng Chung School Diary*, Six Legal Maxims, Procedural Justice

.....

